



当代哲学丛书

我的哲学思想

——当代中国部分哲学家的学术自述



广西人民出版社

我的哲学思想

——当代中国部分哲学家的学术自述

韩民青 夏永翔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区向明

(桂)新登字 01 号

我的哲学思想——当代中国部分哲学家的学术自述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850×1168 1/32 开本

20.25 印张 510 千字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济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50 册

ISBN7-219-02561-0/B·83

定价：27.00 元

前 言

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推动我国经济、文化建设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为我国哲学研究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广大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我国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功绩不可磨灭,他们的学术成就值得认真总结、广为传播。特别是在加速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应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力倡导百家争鸣、敢于创造、勇于进取的精神,使我国的哲学研究事业有一个更大的飞跃。这是振兴中华精神、加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为了认真、深刻地总结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哲学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为了更广泛地传播这些成就,并更有力地倡导敢于创造、勇于进取的敬业精神,推动我国哲学研究事业迅速的发展,我们特组织编纂了这部《我的哲学思想——当代中国部分哲学家的学术自述》。

这部书的介绍文章采取学术自述的方法,由哲学家本人撰写。这些哲学家既有饱经风霜、成绩卓著的老一代学者,又有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成就斐然的年轻一代学者。他们不同的是年龄和阅历,相同的则是他们都为我国哲学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种编纂方式,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哲学界的现状。

我们正处在新旧世纪交替之时。回顾 20 世纪,我们思绪万千;瞻望 21 世纪,我们心潮澎湃。21 世纪将是中华文化重新崛起

的时代,将是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时代。我们应该无愧于这个时代。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哲学家们应振奋精神、勤恳工作,为中华文化的腾飞,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编 者

1993 年 12 月

目 录

前言.....	(1)
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新综合哲学要旨.....	张岱年(1)
走在哲学的道路上	葛 力(14)
精神跋涉的历史轨迹	萧焜焘(29)
哲学翻译与哲学研究	涂纪亮(49)
我的人学思想	王锐生(62)
道德世界寻求	臧乐源(77)
在矛盾、冲突、激荡中追求和谐	周来祥(93)
从抽象虚幻之人走向现实具体的人.....	高清海(111)
在“西马”领域开拓前进.....	徐崇温(132)
我知道什么.....	朱德生(147)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	王荫庭(165)
为填补逻辑空白而辛勤.....	杨百顺(183)
兼容辩证哲学的灵活性和分析哲学的	
精确性,建立哲学新体系	张华夏(195)
审视我们的时代.....	刘蔚华(212)
西方哲学史研究与时代的呼声.....	杨寿堪(234)
探索价值哲学奥秘之路	王玉樑(247)
无尽的学与思.....	叶秀山(266)
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与展望.....	金春峰(282)
中国哲学现代转换的求索.....	张立文(300)
出入哲海觅新知.....	李庆臻(319)
马克思哲学思想之我见.....	张奎良(336)
矛盾之论常新.....	房良钧(350)

沉思哲理 乐此不疲

——关于哲学学科群的探讨·····	张尚仁(365)
从人与对象的关系中探求美的奥秘·····	向翔(379)
社会奥秘之探求·····	景天魁(394)
在科学与哲学的边缘耕耘·····	刘大椿(408)
“让思想站起来”·····	李德顺(422)
探询虚灵的真实·····	黄克剑(436)
革故鼎新,莫堕昔人纸堆·····	李醒民(454)
生存与超越·····	杨春时(470)
认识论之元批判·····	俞吾金(483)
贴近生活 拓宽视野·····	袁贵仁(494)
有心博艺通今古 羞为偏学论中西·····	李存山(504)
追寻人类的来龙去脉	
——物质进化论的人本哲学·····	韩民青(520)
博取众长 独出己意·····	李宗桂(538)
“文化—历史哲学”的探索·····	许苏民(553)
探索个性化的哲学研究道路·····	欧阳康(569)
走出传统框架走向理性深处·····	张一兵(583)
诠释与重建·····	杨国荣(591)
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探索	
——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批判·····	衣俊卿(612)
走向现代伦理·····	万俊人(626)

(本书先后顺序是按作者的年龄顺序编排的)



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新综合哲学要旨

张岱年

一、一般情况概述

我自青年时期即对于哲学深感兴趣，广泛阅读了中国及西方哲学著作，常常思考一些哲学问题，有如汉代思想家杨雄所说“默而好深湛之思”。古代儒家的经典《论语》、《孟子》本来是“童而习之”，但幼年只是背诵，并不了解其中义蕴。后来阅读宋代理学家周敦颐《通书》、张载《正蒙》中对于孔孟学说的诠释，才对于儒家的微言深旨有所理解。《老》、《庄》的玄奥引起了我的兴趣，但我最为服膺的是《周易大传》关于阴阳变易、生生刚健的学说。在吾兄申府的引导之下，我阅读了英国 20 世纪初期新实在论者罗素、穆尔等的著作，对于其所提倡的逻辑分析方法颇为赞赏，对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尤为赞赏。20 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我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哲学的著作的中英译本，深深感到这些著作中的真理光辉，于是认为辩证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我之所以赞同辩证唯物论，主要是因为，我认为辩证唯物论正确解决了西方哲学中“唯理论与经验论”和“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辩证唯物论既肯定了感觉经验是人类认识的基础，又承认理性认识高于感性认识，而适当地说明了二者的关系；同时既肯定了物质是世界的根本，又承认精神有改造物质的能动作用，从而正确说明了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因此，我认为辩证唯物论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同

时认为,逻辑分析方法注意概念的明确,论证的清晰,应亦是哲学思维所必需。辩证唯物论以辩证法为主要方法,而逻辑分析法所谓逻辑指形式逻辑。我认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是不相排斥的,二者相互补充,都是必要的思维方法。同时我更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应注意发掘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优良传统,理解体会中国古代的精湛思想,决不应数典忘祖,专门“言必称希腊”。希腊是应该研究的,先秦诸子也不应遗忘。于是我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法及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以分析为方法而以综合为内容,可以称为新综合哲学。

30年代之初,我发表了《谭理》(1933年)与《论外界的实在》(1933年)等论文,《谭理》讨论事理关系即个别事物与共相的关系,论证共相即寓于个别事物之中而不能脱离具体事物,重新肯定了清初李埏“理在事中”的观点。《论外界的实在》试从对于感觉经验的分析中来证明外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对于“唯心”、“唯实”之说提出反驳。同时又发表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1933年)、《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1934年),论述了个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道德学说的体会。又发表了《中国思想源流》(1934年),论述中国哲学史上“刚动”思想与“柔静”思想的论争与消长,其结束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这是我当时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前途的展望。

之后,我发表了《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1935年)、《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1936年),提出了一系列的哲学观点。我认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应具有四个特征,即(1)在一意谓上是唯物的;(2)在一意谓上是理想的;(3)是辩证的;(4)是分析的。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我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

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即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的精粹思想三者综合起来。这篇《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是我的哲学思想的初步的全面表述，但仅提出一系列的简单观点而已，没有做出详细的论证。

1936年北京(当时称为北平)哲学界同仁召开了一次哲学讨论会，我提出一篇论文，题为《生活理想之四原则》，所讲的四个原则是：(1)理生合一，(2)与群为一，(3)义命合一，(4)动的天人合一。“理生合一”指义与利、理与欲的统一；“与群为一”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义命合一”指客观必然性与道德自觉性的统一；“动的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的调协。这篇论文虽有一定的深度，但是用了一些不通俗的僻涩名词，其文字表达是不恰当的。

1935年至1936年，我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哲学，以两年之力，撰成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是一部以问题为纲领叙述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的专著，内容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概念、范畴作了比较明确的阐释。书中特别详细论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关于宋明哲学，过去许多论者都认为宋明理学分为两派即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我著重提出，宋明理学应分为三派，即程朱以理为本的“理本论”、陆王以心为本的“心本论”，还有张横渠(载)、王海川(廷相)、王船山(夫之)以气为本的“气本论”。气本论是唯物论的中国形式，实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传统。

四十年代初，我开始整理自己历年致思所得，写成《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及《品德论》等论著。《哲学思维论》讨论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一些基本概念与基本规律进行了分析和诠释。《知实论》讨论了知觉与实在的问题，对于客观世界的实在性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事理论》对于“事”、“物”、“理”、“性”等作了详细的剖析，进一步论证了“理在事中”的唯物观点。《品德论》讨论了价值观与道德理想的问题。到1948年又撰写

了一篇《天人简论》，提出“天人本至”、“物统事理”、“物原主流”、“永恒两一”、“大化三极”、“知通内外”、“真知三表”、“群己一体”、“人群三事”、“拟议新德”等十项论点，简要地表述了自己的主要哲学观点。（这些论著，至1988年才以《真与善的探索》为题刊印出来。）

50年代初期，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都集中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哲学系分别设立了几个教研室，于是关于哲学的教学工作趋于专业化了。我属于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于是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对于哲学理论问题存而不论了。其后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也出现了许多波折，时光虚渡了约二十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国的文化学术都遭受了空前的厄运。1978年领导拨乱反正，学术界焕发了青春，我亦逐渐展开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对于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对于30年代40年代的一些观点仍然坚持未改，惟望在有生之年能做出进一步的推阐。

今当略述生平经历：我生于1909年5月，原籍河北省献县。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由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推荐，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和学校失却联系，留滞北平，不与敌伪合作。北平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先生听说我撰写了《中国哲学大纲》，恐其战乱佚失，聘请我到中国大学任教，将书稿印为讲义。1945年抗战胜利，大地重光，翌年清华复校，仍聘我到清华大学任教，任哲学系副教授，1951年转为教授。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5年兼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1978年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被推为会长。嗣后又兼任许多学术团体的顾问。

二、学术思想

现在,当略述我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思想见解。

(一)关于哲学方法论

对于哲学的意义,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哲学是天人之学,即关于宇宙人生基本问题的研讨。关于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都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对于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的问题,人们难以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人们对于这些问题可以各有所见、各有所信,以作为立身处世的依据,哲学的作为即是对于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从而提出一些有理由的信念。

哲学理论包含许多哲学命题。有些逻辑实证论者认为只有科学命题没有哲学命题,这是一种哲学消灭论,是不能成立的。哲学命题有其一定意义。一个哲学命题应是可以验证的,如果一个哲学命题的真伪无可验证,则该命题便是无意义的。传统哲学中关于“绝对精神”的命题,关于“大意志”、“大生命”的命题都无可验证,因而是无意义的。一些实证论者认为关于外界实在的命题也是无意义的,这就陷于荒谬了。实证论者仅仅以感觉经验作为意义的标准,所以陷于偏谬。人们的生活实践充分证明了外在世界的实在性。

在《哲学思维论》中,我论述了演绎、归纳与辩证法的关系。我认为,辩证法与演绎及归纳是三个基本思想方法,各有其畴域而不相犯,相互补足而非相互否定。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都是思维的基本规律,而不是相互矛盾的。我认为辩证方法对于哲学的研究最为重要。我国古代思想家宋钘讲“别囿”,荀卿讲“解蔽”,而辩证法实为最精的别囿解蔽之法。

(二)关于人类的认识

关于人类的认识,我对于外界实在性的问题很感兴趣。有的论

者认为外界实在的问题只能由实践加以证明而不能从理论上加以证明,我则认为,一项论断如其是正确的,那就必然是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证明的。30年代,我写了《论外界的实在》,试图从感觉经验的分析中论证外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对于梦与觉、幻与实,作出了明确的区别。40年代,又写了《知实论》,对于知觉与实在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关于理性认识的来源问题,我也很感兴趣。宋代张横渠提出“德性所知”,实际上是指今天所谓理性认识(中国古代哲学所谓德性实即西方哲学所谓理性)。但是他认为“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这就错了。理性认识实以感觉经验为根据。但是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感觉是个人的,而理性认识则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思维活动是个人的,而思维所适用的概念范畴则是社会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先验论者认为概念范畴是先验的或超验的,这是由于不了解概念范畴等理性认识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实则概念范畴固然先于个人的经验,却非先于社会人群的经验。(在40年代的研思札记《认识、实在、理想》中提出了这一观点,但未能做出详细的论证。)

(三)宇宙本原问题

宇宙本原问题是世界哲学(中国、西方、印度)的中心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中国哲学有其与西方和印度哲学不同的特点。在西方和印度哲学中,都把本体(实体)与现象对立起来,其流行的观点是:“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这种观点,现代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称之为“自然之两分”。(怀氏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中国古代哲学向来不赞同这种两分法。南宋初思想家胡宏批评佛学说:“释氏见理而不穷理,见性而不尽性,故于一天之中分别幻华真实,不能合一,与道不相似也。”(《知言》)这正与怀特海对于“自然之两分”的批评相符合。中国哲学家亦肯定“本”与“物”的区别,《庄子·天下篇》述老聃关尹之学,“以本为精、以物为粗”,而亦承认精粗是

统一的。中国哲学关于宇宙本原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本与物有别而统一。这种观点,宋代思想家程颐称之为“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周易程氏传·序》)。这是多数中国哲人都同意的观点。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宇宙本原的问题包含“道器”问题、“理气”问题和“形神”问题、“心物”问题。“道器”问题和“理气”问题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所谓“思维与存在”的问题;“形神”问题、“心物”的问题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所谓“精神与物质”的问题与“主体与客体”的问题。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又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因而比较惯于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因此,我对于道器问题、理气问题和形神问题、心物问题有较多的思考。

道器问题和理气问题其实只是一个问题。中国近古哲学中,程朱学派主张“道在器先”、“理为气本”,明清时代王浚川(廷相)、王船山(夫之)主张“理载于气”、“道在器中”。朱晦庵曾讲“理在事先”,清代李恕谷(搢)则强调“理在事中”。关于这个问题,我赞同王浚川、王船山以及李恕谷的基本观点。

我认为“事理”问题是“道器”、“理气”问题的更明确的表达方式。一般认为“事理”观念起于隋代华严宗佛学。其实不然。《荀子·大略》说:“凡百事异于理而相守也”。王弼《论语释疑》云:“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皇侃《论语义疏》引)足证“事理”观念古已有之。现代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早年讲“自然哲学”,罗素讲“中立一元论”,都以“事”作为哲学基本概念。我对于怀特海、罗素的“事”概念很感兴趣。在《事理论》中,我兼综了李恕谷及怀特海、罗素的关于“事”的学说,提出了关于事、物、理、性的学说。罗素讲所谓“事”,自称“中立一元论”,我则将“事”改造成为一个唯物主义的概念。

形神问题,西方谓之身心问题。心物问题西方称之为精神与物质的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形神问题问题已由范缜《神灭论》解决了。宋明以来,心物问题比较突出。张横渠说:“人本无心,因物为

心”。“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宋本《张子语录》）这是唯物论的观点。陆象山则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更宣称“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传习录》）王船山严格区别了能知与所知问题，批判了陆王的唯心论。在心物问题上，我是完全赞同横渠、船山的。

（四）关于人生理想

关于人生理想，我提出不同于前哲的“本至之辨”，即认为人类的道德理想与宇宙本原属于不同层次。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一个久远的传统，认为宇宙的本原也就是人生理想的最高标准。老子以道为世界本原，宣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朱子认为世界最高本原是太极，而太极的内含就是仁义礼智四德。陆王认为道德的根源在于本心，本心也即是天地万物之本原。我认为应将宇宙之“本”与人伦之“至”区别开来。人伦道德是宇宙演化的最高成就，是宇宙万象中新的创造。道德虽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但是自然规律不尽符合于道德原则。道德原则是更高一级的规律性。

我注重思考了生命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肯定“义”重于“生”，但也承认“生”的价值，所以说“生亦我所欲也”。战国时代，也有贵生之说，保存在《吕氏春秋》中。但是唐宋以后，抽象的心性问题成为思想家们最关心的问题。对于有形的生命不甚重视了。唯王船山提出“珍生”之说，他说：“圣人者人之徒，人者生之徒。既以有是人矣，则不得不珍其生。”（《周易外传》）“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同上）船山亦重义，他说：“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船山把生与义统一起来，这是正确的。近代西方思想家中，赞扬生命者较多。我考虑生命与道德理想的问题，于是提出“充生以达理”的命题。充生以达理，既充实固有的生命力而克服生命现象中的矛盾，以达到

合理的境界。

(五)关于宇宙人生的基本观点

平生思考关于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提出了八个基本命题，即：(1)物我同实；(2)物统事理；(3)一本多级；(4)思成于积；(5)真知三表；(6)充生达理；(7)群己一体；(8)兼和为上。以下分别加以解释。

(1)物我同实

物是客体，我是主体。主客之分，中国古代即有之。《管子·心术上》云：“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从王念孙校)这分别了所知与所以知。清初王船山区别了能所，断言：“所登者山，不得谓登为山；所涉者水，不得谓涉为水。”“所著于人伦物理之中，能取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内，故如太虚，有感而皆应；能不在外，故为仁由己，反己而必成。”(《尚书引义》)能是主体，具有主体性；所是客体，具有客观性。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于是西方近代哲学中，“我”成为思维的出发点，其实人对于自我的认识后于客体的认识，自我不是抽象的，自我除了能思之外，还有可见的身体。一个没有心肺脾胃的我只是抽象的观念。人自知胸中有心肺脾胃，实以自古传个关于人体解剖的知识为依据。唯心论者宣称“存在即被知觉”，其实“可感”(“被知觉”)是存在的证明而不是存在的根据。外物(客体)与自我(主体)同属于实在。主体的我，在别人看来，也属于客体。

(2)物统事理

一切客体，皆称之为物。物即是个体存在。一切存在都是过程(亦曰历程)。凡物皆是事事相续而有一定之理的过程，其一定之理即此物之性(亦曰本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凡物皆逝逝不已的过程。就过程中的逝逝不已者而言，谓之事。事逝逝不已，亦现现不已。逝逝现现，谓之事事相续。事事

相续,是为变易。变易之中,有其恒常。变易中的恒常谓之理。凡物皆具有一定的恒常之理,是为物的本性。物之性即在物内,事之理即在事中。

(3)一本多级

我于1933年著论阐释新唯物论,曾谓新唯物论的精旨之一为“一本多级”。这在实际上是以个人的观点来说明新唯物论。这是“一本多级”的第一次提出。所谓一本多级,即谓:宇宙大化,物为一本,物质演化而有生命,生物演化而有人类,人具有能思之心。物、生、心(思维)为多级,而物实为生命与心知之基本。物的基本存在容态为气。物为一本,亦可谓气为一本。从其为个别存在而言,谓之物。从其为有广袤而能运动而言,谓之气。张横渠云:“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又云:“一物两体,气也。两故化。”横渠肯定气的实在与变化,这是深刻的。荀子说:“草木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这是古代最早的事物层次论。近代西方突创进化论者亦讲宇宙演化中的不同层次。我认为,“一本多级”是符合宇宙大化的客观实际的。

(4)思成于积

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哲学笔记》)这是关于认识论的最深刻的结论。生动的直观即是感觉经验,抽象的思维即是理性认识。我认为,感觉经验是个人的,理性认识则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理性认识所运用的概念范畴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的积累而逐渐确立起来的。荀子云:“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荀子·性恶》)我认为用“积思虑”来说明概念范畴的来源,是符合实际的。思维所用的概念范畴都原于历史的积累,而不是先验的格式。我用“思成于积”来表达知识中的概念范畴的社会性与历史性。